

红二、红六军团板栗园大捷——

湘鄂川黔苏区反“围剿”的关键胜利

■张磊郭锴

在湖北省宣恩县李家河镇利福田村，巍然耸立着板栗园大捷纪念碑。青山静默，红色五角星在层林黛绿中熠熠生辉。纪念碑高19.35米，宽8.3米，数字寓意着90余年前那场战斗的时间——1935年8月3日。

当日，红2、红6军团在利福田狭谷地设伏，待国民党军第85师完全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发起猛攻。经激烈战斗，红军全歼敌师部、2个团又1个营，俘敌千余人，缴获长短枪980余支、迫击炮6门、弹药600余箱、银圆6万余块。此战成为在敌纵深内以伏击手段速战速决歼灭敌人的经典范例。

着眼大局，密切配合行动

1934年10月，红3军和红6军团在黔东根据地胜利会师。从此，这两部分红军结成一个团结战斗集体。会师时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开始向西实行战略转移。任弼时和两军领导着眼大局，对整个战争形势和自身任务及今后行动方针，进行了审慎研究，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作战，红3军和红6军团应积极配合。

为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，两军共同制定了集中进军湘西的方针，并整顿了组织：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的番号，由贺龙担任军团长，任弼时担任政治委员，下辖第4、第6师；红6军团由萧克担任军团长，王震担任政治委员，暂编第49、

第51、第53团。

10月28日，红2、红6军团由黔东向湘西挺进，歼灭了湘西军阀陈渠珍部的主力，恢复与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。接着又于12月中旬，向常德、桃源展开攻势，开辟了以永顺、大庸、桑植城为中心的广大游击区域，进一步巩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。

蒋介石恐其与中央红军会合，急调湘、鄂国民党军，与追击中央红军的部队组成6个纵队约11万兵力，采取分进合击、严密防堵、攻堵结合的手段，企图以强大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将我两军团扼杀于湘鄂西部地区。

面对强敌，两军团结合实际进行战略转移，并相机歼敌，连续取得陈家河—桃子溪战役、忠堡战斗等重大胜利，钳制与吸引大批敌人，坚持了根据地的斗争，减轻了中央主力红军的压力，为下一步取得板栗园大捷埋下伏笔。

因地制宜，定下作战决心

1935年6月忠堡大捷后，红2、红6军团乘胜回师湘西，以一部兵力围困湘鄂两省交通要道龙山，主力则分散开展群众工作，扩红和整训。在此期间，蒋介石为加强对红军的“围剿”，决定将从江西调到利川的第85师拨归徐源泉部指挥，并另从江西调集第26路军的1个师接替第34师的防务，以便鄂军能集中兵力作战；同时，命令湘、鄂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。



板栗园大捷纪念碑。

资料照片

巨炮神威撼八方

——中国古代改进型火炮

■曹波



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

明中期以后，大航海时代浪潮推动中西方交流日益密切，西方新式枪炮技术通过战争缴获、传教士传播、贸易中转等途径传入中国，直接推动明朝火器技术革新。以佛郎机炮、红夷炮为代表的西洋火炮凭借远程、高射速、强威力等优势，逐渐取代传统的铸炮，开启了中国火器近代化转型的序幕。

佛郎机炮作为15世纪后期流行于欧洲的后装火炮，其技术雏形可追溯至14世纪末的西欧，1410年左右由葡萄牙人改进成现在我们常见的佛郎机炮形态。新航路开辟后，佛郎机炮成为西方殖民者重要的舰载火器，他们借此大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。

一般认为，佛郎机炮传入中国是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。正德十二年，刑部尚书顾应祥在广州城外锚泊的葡萄牙舰船上见到了这种舰炮。嘉靖元年，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击败来犯葡军，缴获20余门佛郎机炮。

相较于明朝传统铸炮，佛郎机炮在结构上发生较大变化。其一，采用“母铳街扣子铳”的后装结构，母铳为炮筒，子铳为预填弹药的小型火铳，每门母铳可配4至9个子铳，能快速更换实现连续射击，射速远超前装式传统铸炮。其二，炮管壁厚均匀，可承受更高膛压，大幅降低炸膛风险，战场安全性显著提升。其三，炮身配备准星、照门等瞄准装置，有效增

大射程并提高命中精度。其四，子铳与母铳嵌合紧密，较好解决了火药燃气泄漏问题，确保发射威力。鉴于佛郎机炮的突出优势，明朝军器局、兵仗局于嘉靖二年组织工匠仿制30余门，随后配发至北部边防与沿海驻军。

大明工匠在仿制佛郎机炮的过程中，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并发挥聪明才智，研发出多型更适配本土作战需求的佛郎机系列火器，包括“舰载佛郎机”“马上佛郎机”“万胜佛郎机”“佛郎机流星炮”等。这些火器各有侧重，适用于各种战场，成为明军破敌利器。

此外，工匠还参照佛郎机炮原理改制传统铸炮，无敌大将军炮便是典型代表。它以旧式重型将军炮为基础改制而成，是一款车载重型火炮，重1050斤，行军时需依托炮车运载，每炮配备3个子炮。使用时，先在炮身下方垫放木块调整俯仰角度，再将子炮嵌入炮身的装弹室，对准目标即可发射。每发子炮内装有500余枚小铅丸，射出后弹着面积大，杀伤威力强。清朝前期的奇炮、子母炮，均属于这类佛郎机式火炮的衍生型号。

佛郎机炮虽具备装填速度快的优势，但因子铳装药量小、母铳口径不大，导致其威力有限。当威力更为强劲的红夷炮传入我国后，佛郎机炮逐渐退居次要地位。

红夷炮是明末对欧洲长管加农炮的

徐源泉时任国民党第10军军长兼湖北省主席，其指挥的纵队是“围剿”红2、红6军团的6个纵队之一。尽管此时他的兵力得到增强，但因部队屡遭红军打击，已丧失进攻勇气与信心，他所关注的仅是如何将部队推进至湖北边界，阻止红军再次进入鄂西。

7月30日和8月1日，徐源泉电令所属各部向湘鄂边界迅速推进，先后命令驻鹤峰太平镇的第34师2个团和驻宣恩高罗的第48师1个旅推进到沙道沟地区，已进至宣恩小关的第85师开到李家河，同时令驻高罗的暂编第4旅以一部兵力占领水田坝，驻来凤的第123旅占领李家河，以掩护第85师、第34师和第48师的开进。

红2、红6军团在徐源泉下达开进命令的当天，便截获其密电，掌握了其调整部署的计划。军委分会随即召开会议进行商讨，认为：敌军第85师刚到鄂西，对当地情况全然陌生；其行军道路狭窄崎岖，多位于深峡谷底，两侧是高山密林，侦察搜索与兵力展开均极为困难；且该师从纵深向前运动，戒备可能较为松懈。而鄂西地区其他敌军分守于几座县城和较大集镇，据点间空隙较大，便于红军穿插机动。因此，军委分会决定集中主力，再次进入鄂西敌人的纵深，利用第85师的弱点，以伏击或截击手段将其歼灭于运动战之中。

声东击西，设伏于板栗园

8月2日，鄂军从太平镇、高罗、小关等地开始行动。为麻痹敌人，打乱其整体开进部署，红2、红6军团于当日从龙山兴隆街突然北进至沙道沟附近。这一行动让徐源泉产生错觉，他判断红军的打击目标可能是从太平镇、高罗向沙道沟推进的第34师或第48师142旅，于是立即下令这两路部队停止前进，严加戒备。这一决策恰好为红军深入鄂军战役纵深、前出至第85师侧翼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当日下午，第85师抵达宣恩以南的上洞坪。敌师长谢彬认为红军会向北行动，且沙道沟距离已方行军路线较远，再加上第123旅已占领近在咫尺的李家河，因此未加防范，仍按原计划向李家河南进。

3日晨，第85师贸然继续前进。红2、红6军团主力此时突然改变行动方向，从高罗和李家河之间楔入敌人纵深，沿山间捷径向西南疾进，于11时抢先赶至第85师必经的板栗园东侧的利福田谷地设伏。

该谷地处板栗园与李家乡之间，长约15里，宽不足1里，北侧山上森林茂密，利于隐蔽，南侧山上岩石裸露，陡峭难攀。红军因取得先机之利，即以第4、第6师组成一个梯队埋伏于谷地北侧的安家坡山上，待机歼敌。

与此同时，敌第85师按第510团、特务营、师司令部和第505团的行进次序，于上午进至利福田西北七八里路的板栗园。由于红军行动迅速，隐蔽良好，该师完全没有觉察到红军的伏兵。他们在板栗园看到赶集人群密集，又接到从李家河返回的侦察分队报告，称李家河上秩序平静，友军驻守在碉堡内，从板栗园到李家河的沿途有不少钓鱼、打柴和种地的百姓。谢彬据此判断此处局势安稳，红军距离尚远，前方又有友军依托坚固阵地掩护，当务之急是尽快赶到目的地。

伏击制胜，奇袭全歼敌军

3日12时许，敌第85师完全进入红军伏击圈。第4师首先向敌开火，将敌前卫第510团紧紧压制，接着发起多路突击，一举将第510团的大部歼灭于三灵沟、潭家岩地区。见状，敌第85师特务营和第505团2个营匆忙展开战斗队形，企图抢占红军伏击阵地的莫家坡大山，以稳住阵脚。

贺龙当即命令第6师迅速抢占莫家坡制高点，歼灭向上攀登的敌人。第6师先敌占领了山头，并沿山脊配置兵力和火力。当敌人进至距离山顶三四十米处时，红军突然开火，猛冲下去，一举将敌人3个营全部消灭。

与此同时，红军后续部队第17师也及时赶到，从第4师左翼投入战斗，与红2军团一起攻击退守谷地南山的敌军。战至23时，红军夺取了巴里核山，歼敌第505团1个营，战斗至此胜利结束。

板栗园战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，红军结合实际制定了对湘军取守势、对鄂军取攻势的正确作战方针，加之掌握敌情准确及时，战场选择适当，抓住敌人的弱点，集中兵力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战法。

战后，红2、红6军团返回根据地，于8月8日在芭蕉沱一举击溃陶广纵队的10个团。红军接连取得的胜利，不仅让鄂军、湘军彻底丧失进攻信心与勇气，更迫使蒋介石放弃依靠湘、鄂军队“围剿”红2、红6军团的计划。随后，蒋介石下令湘、鄂军队转入防御。至此，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成功粉碎国民党军的“围剿”。

红夷炮。

清军入关后，所制的红夷炮数量增多，比较著名的有神威无敌大将军炮、威远将军炮、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及得胜将军炮等。它们大多沿袭明末红夷炮的样式。

其中，最具代表性的是神威无敌大将军炮。它是一种大型前膛火炮，制于清康熙十五年。该炮为铜质，炮身長2.48米，重2000余斤，口径110毫米，配备木制炮车。炮管前细后粗，底如覆笠，有五道加强箍，两侧有耳，尾部有球冠。炮口与底部正上方有“星”“斗”供瞄准用。每次发射装填3至4斤火药，炮弹重6至8斤。此炮多用于攻城守寨和野战，在与沙俄的雅克萨之战中曾发挥巨大作用。

据《清会典事例》记载，在1674年至1721年间造各种火炮900余门。随着火炮的大量制造，康熙三十年成立火器营，专门练习枪炮的使用技术。雍正五年，清政府规定各省绿营兵每千人置炮10门，火炮成为清军的主要装备之一。清朝中期以后，火炮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。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，为抗击殖民主义者的侵略，各地军民又造了一些重型火炮。洋务运动开展后，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，中国古代火炮逐渐被近代火炮所取代。



明朝时期的红夷炮。

资料照片



上图：江苏省东台市周巍峙王昆艺术馆中的周巍峙、王昆雕塑。资料照片



左图：周巍峙与王昆合照。资料照片

抗战烽火中走出的红色伉俪

■王小朋 张苗

“北风吹，雪花飘”，一部诞生于延安的歌剧《白毛女》，让歌剧表演艺术家王昆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：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，一曲激昂战歌，在音乐家周巍峙的笔下，谱写出无数志愿军官兵舍生忘死、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。周巍峙与王昆，是一对革命伉俪，他们因抗日相识、因革命结缘，以笔为刀、以歌为枪，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战斗。

周巍峙原名周良骥，1916年生于江苏东台，自幼喜爱戏曲与民间音乐。1930年，他来到上海，进入《申报》工作。1931年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。在时代浪潮的激荡下，周良骥的爱国情怀愈发炽热。为表明自己与黑暗势力巍然对峙的决心，他正式将名字改为周巍峙。

1934年起，周巍峙投身左翼文艺活动，参与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组织工作，创作了《前线进行曲》《起来，铁的兄弟》等多首在当时广为传唱的抗战歌曲。之后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，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。1938年11月，根据党中央指示，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抗战前线开展工作。时任服务团主任的丁玲因工作安排留在延安，作为副主任的周巍峙毅然挑起重担，带领团队前往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，深入敌占区开展演出、宣讲等宣传工作，鼓舞军民坚定抗日到底的决心。

1939年，周巍峙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至河北唐县，当地干部向他推荐了妇女干部王昆。王昆自1937年起便投身抗日文艺宣传工作，她天生一副好嗓子，擅长用激越动人的歌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，战士们和当地群众都爱听她唱歌。听过王昆演唱后，周巍峙认定她是个可塑之才，将她吸纳进西北战地服务团。从此，王昆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地文艺工作者，她跟随队伍翻山越岭，奔走于前线与村庄之间，为官兵和群众演出。

工作中的密切协作，让二人的感情悄然升温。1943年，王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秋，周巍峙与王昆在晋察冀边区的战火洗礼中正式结为夫妻，从此携手开启二人并肩前行的革命历程。

1944年，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。周巍峙调入鲁艺戏剧音乐系，担任助理员兼鲁艺文工团副团长；王昆则进入鲁艺学习声乐，成为鲁艺文工团成员，边学习边从事文艺宣传，两人依旧并肩战斗、一同生活。

1945年，为向党的七大献礼，一部反映旧社会农民悲惨命运与翻身解放历程的大型歌剧《白毛女》应运而生，王昆成为女主角喜儿的扮演者之一。同年4月，歌剧《白毛女》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公演。演出中，旧社会里穿着破棉袄的淳朴农家女孩喜儿，从遭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到拿起刀锄奋起反抗，展现出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逐渐觉醒、勇敢斗争、争取自由解放的过程，一次次将现场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。《白毛女》随即成为延安解放区最受欢迎的歌剧。许多战士在枪托上刻下“为杨白劳报仇”“为喜儿报仇”的字样，带着这份朴素信念走上战场奋勇杀敌。而王昆所扮演的喜儿，从此成为人们心中跨越时代的经典记忆。

抗战胜利后，周巍峙与王昆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，继续用作品激励人

心，鼓舞士气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们带领青年文工团踏上了欧洲的舞台，用艺术传递中国声音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。在抗美援朝期间，周巍峙创作了激昂的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，鼓舞英雄儿女，高唱战歌，毅然奔赴前线，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。王昆则亲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，二人以不同方式携手为志愿军歌唱、为新中国歌唱、为人民歌唱。

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周巍峙与王昆始终保持着炽热的革命热情。1964年，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应运而生，这部作品以歌舞形式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官僚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。周巍峙担任幕后总指挥，统筹细致、有条不紊；王昆以独具匠心的演绎演唱《农友歌》，受到广泛赞誉。这部作品是新中国文艺的一座高峰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，汲取强大的革命精神和力量，勇往直前，夺取新胜利、创造新辉煌。

从抗日烽火中的初识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携手并肩，这对红色伉俪从一开始就和革命、和音乐、和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紧密缠绕在一起，他们的艺术生命，历经血与火的淬炼，永恒跳动，万古长青。



链接历史